

鲁迅三部曲

第一卷

张旭东 著

杂文的自觉

鲁迅文学的
“第二次诞生”

(1924—1927)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鲁迅三部曲

第一卷

张旭东 著

杂文的自觉

鲁迅文学的
“第二次诞生”

(1924—1927)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

作者：张旭东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ISBN：9787108059345

字数：559千字

本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研究系教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代表性著作包括《幻想的秩序》、《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反思》和《批判的文学史》。

小序

对于许多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校园的人来说，鲁迅不只是一位现代文学作家，更是个人阅读史上的一个保留节目。在始发于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读书无禁区”和“欧风美雨”的时代洗礼中，鲁迅像一道时隐时现的风景，有时是近景和外景，有时则是远景和内景。在各种各样私人或群体必读书单上，“鲁迅”恐怕并不属于那些曾给人带来终生难忘的震撼和醍醐灌顶的启示的伟大时刻，甚至多数时候并不占据意识的前台。事实上他或许更像一个幽灵独自徘徊在后台。相对于《约翰·克里斯朵夫》《浮士德》《精神现象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卡夫卡，鲁迅作品也许更像一段旧时记忆，一个放不下却尚未来得及回答或细想的问题。这个幽灵般的影子或“脚步声”从不曾消失。不如说，正是通过这种略显边缘化的、不连贯的在场，它构成我们阅读史内部一条隐秘线索，进而揭示出其中超越个人兴趣的集体性和历史性。

在社会性引力场作用下，当年学校内外的读书口味大体上是重西方轻中国，在“中国”内部则重古代轻现代，中文系概莫能外。教学体系下的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课程，似乎也并没有增加学生对鲁迅作品的亲近感。就我个人而言，此前阅读鲁迅的个人经验（它可以直通童年记忆）同专业学习之间的接口，不是现代文学而是比较文学。这同我本科论文指导老师乐黛云先生的学术背景有关，亦可谓一种偶然。乐老师本是现代文学出身，但那时刚结束在哈佛和伯克利为期三年的访问，回到北大着手组建比较文学学科和全国比较文学学会。但“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鲁迅”或“鲁迅与尼采”这样的题目的确立刻透出一种无可回避的必然性：在所有20世纪中国作家中，鲁迅无疑最具有世界语境中的对话、批评与阐释价值。按学生时代的急进和武断态度，其作品简直是唯一“拿得出手”、“值得”或“经得起”认真持续的思考与讨论的现代中国文学文本。

这些置于意识“后台”和视域“边缘”的印象、经验和问题，为日后同鲁迅反复的、看似偶然的相遇或遭遇埋下了伏笔。在“文化热”期间西学理论方法论大潮的高点，鲁迅忽然在自己笔下同本雅明的寓言批评和历史哲学结合在一起，或不如说本雅明的思想和语句，顺着中译者潜意识里的兴奋点，在另一个历史文化时空里鬼使神差般地找到了鲁迅。写于1988年6月的一篇名为《遗忘的谱系：鲁迅再解读》的长文，本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刊第七辑而作，后收录于1997香港牛津版《幻想的秩序》（202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第二版），可算我第一篇“鲁迅研

究”论文。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是标准的“非主流”和“体制外”写作，对鲁迅和本雅明这两个话语和风格系统的联系、比较和分析也未免有失生硬、缺乏批评的中介，但其中的问题意识和批评直觉（它由文章的原始副题“寓言、历史与重读鲁迅”暴露无遗），仍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作者三十多年后对鲁迅所做的更为系统的分析与阐释。

在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本已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自己第一本英文专著《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两卷本，却不顾两位导师的建议，执意要在毕业赴职前六七个月时间里，另写一部以周作人小品文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这种行为看似心血来潮，背后却有鲁迅的幽灵作祟亦未可知。系统阅读周作人并对其小品文写作做出初步的分析和判断，同进一步阅读鲁迅当然可以构成一种不可或缺的互补和对照关系，或也可算一种“曲线治鲁”。事实上，分析周作人的写作实践和理论为我打开了白话散文同世界散文和散文史之关系的新视野，为日后从杂文入手重读鲁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和批评的出发点。也因为这层关系，这部博士论文（1995）至今仍未修改成书出版，只有个别章节及其中译零星发表。不过，它仍是我在“学院建制内”做“周氏兄弟研究”的“尝试集”。

再次回到鲁迅已是十年之后。彼时在批评理论、美学、政治哲学和中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等领域的工作逐一告一段落，于不经意间也爬完了象牙塔里的职业楼层。但表面上的精力充沛与行动自由，往往隐藏着对新的紧张、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下意识渴求。这种时刻和状态，或许竟最有利于鲁迅像“非自主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般从“忘却”下面浮出来。2006年秋冬，我第一次受邀访问东京大学国际哲学中心，几乎想也没想就决定以鲁迅、尼采和本雅明为题做八场演讲。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西方学术语境下，以中国文学经验为材料，向具有深厚鲁迅研究积累并取得非凡成就的日本学界介绍美国批评理论“前沿”问题和方法。回头看，这次东大访问，是我将鲁迅研究提上议事日程、置于意识前台和中心的契机与转折点。自此同日本学界保持的密切联系和深厚友谊，也成为我阅读鲁迅时一个不可或缺的个人激励和思想参照系。

从2007年开始，大致按照重读《鲁迅全集》的节奏，我相继在纽约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了几次鲁迅研究课程；在国内外国学界做了一系列关于鲁迅文学批评分析和理论阐释的讲座、座谈和演讲，但内容偏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创作和“思想”。从2008年开始，我的研究兴趣逐渐聚焦于鲁迅杂文和鲁迅文学风格的现代主义维度，于2008年暑期和2011年秋分别

在北京大学和纽约大学组织双边师生研讨会（其中纽约大学会议名字就叫“杂文的时代”）。2009年发表的《杂文的自觉》《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等文章，就是这一时期阅读的阶段小结。在此期间，我对鲁迅小说现代主义形式手法的分析，对杂文“政治本体论”及其感性外观的分析，以及对鲁迅的记忆-时间结构的分析，得到了国内外不少同事和老友的鼓励和建设性批评，也在青年学者和学生中间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和讨论。2012年，经王德威教授引荐，同哈佛大学出版社达成口头协议，计划于近期内按拟定的内容提要 and 章节目录提供一部鲁迅文学研究专著书稿（本书“引言”章介绍的“六大命题”，即取自英文专著简介中的“六点提纲”）。但随后几年，随着国内兼职工作的展开和国际批评理论中心（ICCT）多边合作的日益扩大，自己的时间精力变得有些碎片化，英文版鲁迅专著写作计划一拖再拖，事实上被束之高阁。这期间的文章多收录于《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和《批判的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从中可见自己的研究兴趣不断被当代议题、理论议题和政治议题所吸引或“带跑”。在鲁迅研究方面，只是在ICCT北大中心博士后项目下专设了一个鲁迅研究平台，以青年学者为主组织小范围、国际化的学术研讨。这种力不从心的尴尬状态，直到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此前二十多年来视为常态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戛然而止，方才得以彻底扭转。这个仍在持续的逆境给所有人带来的不便、艰难和茫然自不待言，但对于自己酝酿多年的鲁迅研究写作计划来说，却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话虽如此，在2020年3月纽约大学“封校”后，自己仍经过了长达半年的心理和日常生活习惯上的适应和调整，方才进入鲁迅写作计划的全速运行状态。在这六个月里，自己慢慢从风声、雨声、叫骂声、爆炸声声入耳的焦虑烦躁状态，过渡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潜心写作状态。每日有规律的写作，也逐渐从开始的清扫外围和“还旧债”模式转向聚焦于鲁迅。起初只是打算把学生数年前就已替我准备好的80万字讲课录音整理，按出版标准修改打磨一番。但很快我便放弃了这条“捷径”，决意另起炉灶，从头写一部系统的、具有批评方法论意义和文学原理性探讨性质的鲁迅文学分析阐释的著作。

按问题、材料和分析阐释路径，整个计划分为三卷：第一卷分析鲁迅文学在1924—1927年间以杂文为核心的“自觉”和“成为自己”；第二卷分析“上海时期”（1927—1936）的创作；第三卷处理鲁迅除杂文和主要翻译写作外的创作，包括短篇小说、散文诗和回忆自叙体“美文”。呈献于

读者手中的这本《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是这部鲁迅研究三部曲的第一卷。

三卷本围绕六个命题展开论述，即：一、文学在鲁迅研究中的首要性；二、杂文在鲁迅文学分析中的首要性；三、鲁迅风格的现代主义特征；四、鲁迅文学的哲学构造；五、鲁迅文学的政治性与政治本体论；六、“作为写作的翻译”。在本卷“引言”里，我对这六个命题做了初步的介绍。各卷开头都有一个长篇“批评导论”，扣住各卷具体处理的文学经验和文学现象，进一步对这六个命题逐一做更深入的分析 and 讨论。

在北京大学32周年之际，周作人曾作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大的支路”。他写道：

有人说北大的光荣，也有人说北大并没有什么光荣，这些暂且不管，总之我觉得北大是有独特的价值的。这是什么呢，我一时也说不很清楚，只可以说他走着他自己的路，他不做人家所做的而做人家所不做的事。我觉得这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地方，这假如不能说是他唯一的正路，我也可以让步说是重要的一条支路。（周作人，《北大的支路》，1930）

周作人自称并不怀抱着什么“北大优越主义”，只是觉得它应该保持自己的精神。对于这种精神，周作人并未故弄玄虚，只直白地说无非是“积极的工作，要奋勇前去开辟人荒，着手于独特的研究”；此外还有不模仿他人，不随大流等，但这些其实本已包含在“奋勇开荒”和“独特的研究”里面，是学术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所谓“支路”，自然是相对于“干路”而言。对此周作人有些闪烁其词，只道在“读书”和“救国”之间，他也说不清主次关系，“或者革命是重要一点亦未可知？”因此他“姑且假定”：“救国，革命是北大的干路吧，读书就算作支路也未始不可以”，于是便有了“支路”一说。然而，鲁迅杂文倒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支路”，正如鲁迅和鲁迅文学的存在方式，本身也都指向一条“重要的支路”，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成为中国现代性道路和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寓言和象征。今天日渐专业化、体制化、碎片化的学界，固然不再为“救国”“革命”“启蒙”这样的“大叙事”所左右，但我仍愿意把自己在鲁迅文学批评阐释上所做的一点努力，视为鲁迅研究“支路”上的一次探索。

2022年9月8日于纽约

引言

伟大文本的开放性与自我再生能力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一块基石，也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块基石。作为起源性的存在，鲁迅无论就其文本还是就其道德形象而言，从来都不仅限于固定的历史时空或时代性议题，而是随着时间和历史经验一道生长、变化、解构和重构。鲁迅文学作为高度个性化、风格化的社会性象征，在鲁迅留下的文字之外，也包括这些文字所涵盖的种种解释的可能性和歧义性；而后者同样也随着时间、历史经验和批评意趣的历史性变化而不断生长。

本雅明说“灵韵”“光环”或“气息”（aura）的特点之一是它有一种“回视”或“把我们的凝视还给我们”的特性；而这种回视能力事实上又是由以往世代的欣赏者赠与作品的“景仰和爱慕”的帷幕构成的。参看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第十一节，《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59—165页。

在整个中国新文学史和当代中国生活中，鲁迅文本和鲁迅形象独具一种向当代读者回视或把我们的凝视还给我们的特性；这种“回视”效应在美学意义上为“鲁迅”打上了一层光环或“灵韵”，赋予它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气息甚至人格魅力。^①但在批评的意义上，这一切无非是再一次证明，鲁迅文本和鲁迅形象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解释、评价、论争乃至时代性意识形态总体氛围，透过重重“接受史”的过滤甚至扭曲，传递和呈现到新一代读者面前的。鲁迅文本既是源源不断的灵感激发，也是解释的挑战甚至障碍。鲁迅接受史，包括作为知识和观念生产领域的“鲁迅研究”和文学教育建制组成部分的“鲁迅阅读”，一方面固然是持续的、开放性的“打开文本”的话语场，另一方面也必然意味着种种磨损、消耗、征用、滥用，制造着大量冗余和赝品。这是一切伟大文本在历史中传播、流通和再生的宿命。

某个意义上，伟大文本的“伟大”，正取决于它们的“自我校正”和“自我复原”能力；这种能力来自文本内在的激进性和颠覆性，同时也来自它潜在的经典性和普遍性。前者由文本具体的生存情景及其特殊的历史视域所决定，后者则取决于它在长远的传统和更开阔的审美与思想空间中

的位置和关系。百年来的鲁迅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文本能够朝向不同历史和政治现实开放自身、同时又针对这种现实和思想不断回到自身，恢复并重新激活其能量源头、价值指向和审美自由，从而在自身的象征性存在中引发持久的意义解释和意义生产，甚至通过持续不断地参与这种意义、形象和观念的解释和生产活动而不断建立、打破、再建立围绕其文本自身的话语体系。这是所有伟大文本融入永恒的当下、建立自身连绵不断的接受史和阐释史的形成过程。在这种流变过程中，伟大的文本通过一种变与不变的辩证法确立自身的形象和寓意。

尼采，“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Life”（历史之用及其滥用），参看 *Untimely Meditations*（不合时宜的沉思），edited by Daniel Breazeale, translated by R. J. Hollind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9-123。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edited by Keith Ansell-Pearson, translated by Carol Dieth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海德格尔在1933年所作《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1933年海德堡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一文末尾引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这句话（τά ... μέγλα πάντα ἐπιφάλη.../All that is great stands in the storm），转引自 Gunther Neske & Emil Kettering (eds), *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0, pp. 5-13。

面对鲁迅文本，当代读者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幸运：它几乎以一己之力，把中国文化思想讨论推向尼采所谓“历史之用及其滥用”的反思；推向“道德的谱系”之批判与重写；推向在深刻的怀疑中重估旧价值、创造新价值的抵抗和进击。^⑫只有在这个批判性、颠覆性的哲学视野里，海德格尔在谈及柏拉图时所说的“一切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中”方才获得一个当下的、具体的所指。^⑬这个岿然的“矗立”绝非静止不动，而恰恰是“伟大的事物”在面对种种内部和外部的危机与挑战时的自我动员、自我确证和自我超越的能力及潜力。这种能力和潜力并非“天赋”特权，而是来自这些文本结构内部的矛盾和张力、多元和一体、杂糅和单纯。这种结构力量往往是通过这些文本在时间中的遭遇方才被充分激活并显现出来。经由一次又一次迎战和抵抗各种阅读和解释的挤压、围剿或“滥用”，鲁迅文本得以超越种种被囚禁在具体历史阶段及其语言与意识形态牢笼中的伪价值、伪真理和伪目的论，从而继续把自身确立为探索、追求、拥抱和实践真价值、真现实、真目的的形象、风格和寓意。

只有在这种反目的论的合目的性意义上，鲁迅文本在致力于“价值重

估”和“谱系学”批判的同时，才能够不断“回归”那种由存在和生命在更大时空范围里（它不但包括文明，而且包括自然；不但包括人，而且包括所有其他生命和生物形式）、通过某种“自然选择”（“天择”）而确立的生命原则和价值。通过颠覆和瓦解种种固化的、神秘主义的或权威主义的形而上学误读，通过破除种种被当作真理、实质和“规律”而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的现实观念，鲁迅文本将自身确立为破虚妄的“希望的原理”和从生活的虚无主义本质中确认并阐发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斗争。这是鲁迅文本能够经受并穿越时间的风暴，在自身的危机、怀疑和不确定性中将自己变成一种持续的能量与强度的根本原因。它通过把自己呈献给永恒的当下而获得其深远的历史性。

承认经典文本的历史地位，意味着每一次重读都是一次全新的遭遇和相逢，一次文学经验的复活与再生，一次意义解释的继承、清理、颠覆和重建。近代西方经典解释理论把语言的实际使用比作钱币的流通，认为它会在此过程中发生质与量的磨损、减耗和贬值，因此需要不断地铸造新币，以保持其价值、分量和信誉的饱满足额。在鲁迅阅读和鲁迅研究领域，每一代人都需要通过重铸语言、发明概念、创造新的阐释系统，来确认鲁迅文本同自己时代的关系，确认鲁迅和他时代间的紧张关系同我们自己当下“阐释斗争”的相关性。这不但是重新回到作为源头和起源的鲁迅的必经之路，也是通过与这个源头再一次建立直接的阅读、批评和阐释关系，重建或重写我们自身的阅读史和精神史的不二法门。这种重建源头与当下之直接关系的重读必然是批判性的，因为它事实上再一次“拉直”和“折叠”了鲁迅阅读史的范式传承，或者说为意义解释的“星座”式布局带来新的亮点，从而改变意义空间的形状，带来新的总体性。毋庸置疑，这种“拉直”的介入，本身也只能在既有阐释场域力场的空间曲面和空间折叠中完成。

鲁迅文学指向自身、指向虚无，同时又指向未来、指向新的更高的价值，但它自身的存在方式在根本上讲却是审美的。换句话说，作为观念和价值的鲁迅文学，依赖于鲁迅写作的语言艺术、风格特征和形式自律方才能够同读者进行有效的交流，才能够在这种文学阅读活动中实现自己。审美范畴所带有的本质上的感官性、个别性、直接性和歧义性似乎同体制化的鲁迅文学形象和定义相矛盾（以流俗眼光看好像是“拉低”了它们）；但事实上，这个审美范畴或文学性媒质与存在方式，正是一切关于鲁迅的社会性和思想性讨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其意义建构和话语建构的前提。如果鲁迅文学具有某种“内在价值”和“真理性”，那么它们事实上都只是阅读、分析和阐释的结果，也只能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寄

居在阅读分析和阐释的开放结构和自我运动之中。在这个过程的任何一点上所产生的“意义”和解释，都没有固定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实质”，却可以在文学和审美分析的范畴内持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形式创造能力，这其中就包括在鲁迅文学阅读中不断被打开的时间、经验和记忆/忘却结构，包括激进虚无主义的抵抗和斗争原则（“希望”的形而上学），也包括对生命、存在和人类作为生物种群之未来的“科学”意义上（如“进化”）的肯定。在所有这些“内容”方面，文学风格、审美形式和语言艺术形态都不仅只作为“感性外观”存在，同时也作为“理性内容”存在。甚至连作者个人情绪或生活态度这样“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也并不是低于理性认识或形象思维的“混乱”，而是在稳定的自主运动中，在文学形式（文体、体裁、风格等等）的自我颠覆/自我再造的韵律中，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真理认识方式和社会表现方式而存在。它们都包含着关于现实和真理的严肃性，但这种真理意义的严肃性的获得和表达，却是通过以文字和写作为中介和武器的存在搏斗和风格实验而完成的。如果说鲁迅文学也是关于价值和意义的持续而严肃的本体论探讨，那么这不过是指出了鲁迅文学风格审美构造的一种效果和一个方面。

贺麟、王玖兴译文为：“因为武器不是别的，只是斗争者自身的本质；而这种本质，仅只对斗争者双方相互呈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4页。

因此可以说，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化与思想空间中的位置与特殊性，恰恰来自鲁迅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审美范畴内部的自由，使得鲁迅文学能够以其独一无二的语言效果和感性形象，为现代中国的历史真理和价值批判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依赖的参照-映证系统和能量储藏所。这个文学空间是一个记忆载体，一个风格面貌的信心来源；它也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互动的纽带与中介——鲁迅知道，那些“偏爱”和“憎恶”他的人，喜欢或厌恶的最终是他的文字。它的高度自觉、高度个性化的文学形式像一个高速自转的陀螺；这个陀螺的旋转来自外力的驱动或“鞭打”，然而它在自己单一的、指向“虚无”的、专心致志的向心运动中，却能够为外部世界提供一个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稳定的情感指向、道德指向甚至历史认识的真理原则。这种精神的自主导航功能同鲁迅文学的艺术特质——特别是同鲁迅写作的形式自觉和内心自由——有着最密切、最深刻的关系。鲁迅文学早期的“听将令”、中期或“过渡期”的“自觉”，归根结底都是服从这种写作的自我指引的决断；这种决断或许使作者陷入人生的寂寞、痛苦、怀疑和彷徨，最终却可以让作者

沿着他写作的宿命，在其风格和审美的自我实现与更高的自由中，通过这种自觉和自由带来的更强大的文学行动能力和创造性将自己拯救出来。这就是鲁迅通过鲁迅文学“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在这种时刻，我们无法也无须区分“舞蹈和跳舞的人”，因为后者已经消失并实现于前者，因为“人”或“意识”业已完全融入了语言、形式、风格和文体的游戏和搏斗。或借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武器就是战斗者自身的本质”^④这一说法，我们也可以说作为“匕首与投枪”和“攻防”之利器的杂文和杂文写作法，正代表着鲁迅和鲁迅文学的历史实质和精神实质。

我们也看到，当鲁迅文学进入炉火纯青、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天命之年（“上海时期”），“杂文的自由”反倒更为“外向”，更自如而老练地进入历史认识、历史批判和历史再现的“叙事”斗争中去。这也提示我们，鲁迅文学的文体自觉和文体自由，从来不仅仅是指向自我的个体自由、指向形式自律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努力。它们更是一种能力、权力或“力”本身，追求的是在具体社会空间和道德谱系中的认识与批判、模仿与再现。具体的、社会性政治性的文学实践和文学行动，是“杂文的自由”即鲁迅文学内在自由最高形式的运行方式或方法。换句话说，这种形式自由只有在其内容中，即在其现实表现和历史表象中才能充分获得其“感性显现”和方法及结构上的确定性。

本书所要分析和处理的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文字作品，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的基点都在于鲁迅的文本，以对它们做出有理论性和思想意义的阐释为目的。从这个前提出发，我提出若干基本工作假设和主要的框架性论点，在全书“总论”部分加以介绍，作为本书内容、思路和方法的概述。在这篇“引言”中，我将对鲁迅文学整体精神面貌和哲学构造做一提纲性质的分析评述，以此为全书提供一个理论性铺垫。

本书的基本论点由以下环环相扣的六个原则性出发点或原理性命题组成，即：

一、文学鲁迅的首要性：鲁迅首先是、最终仍是文学家。鲁迅文学在有关鲁迅的所有讨论中占据首要位置，是普遍媒介，具有“最后发言权”；同时，文学和风格内在的复杂性、多样性、灵活性和歧义性，也规定了阅读和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二、鲁迅的哲学：鲁迅的文学价值和风格外貌都有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这个基础是一个存在诗学和存在本体论的时间政治构造，它需要在

文学本体论的概念层面和哲学概念的空间里予以专门分析。

三、杂文的首要性：鲁迅文学是在小说中诞生、在杂文中“再生”的。杂文的自觉作为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为鲁迅文学带来了新的质、新的价值、新的审美品格与风格面貌。杂文不但在创作数量上占据鲁迅文学的主体，更在理论意义上代表鲁迅文学的总体和实体，提示着它在历史和文学范畴里的更高的必然性。因此，鲁迅杂文在鲁迅文学中具有首要性；它是鲁迅文学的主语码，也是打开鲁迅文学本体论和风格构造的一把钥匙。

四、鲁迅的现代主义：鲁迅文学在总体上和本质上具有深刻的现代主义风格特征。传统的写实主义、历史主义阅读习惯和分析范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鲁迅文学同它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之间的互释关系，但在终极意义上并不能充分打开鲁迅文学文本，也缺乏在文学本体论和文学批评实践层面推动鲁迅文学研究持续创新和深入的理论资源及方法论动力。在世界历史范围里看，鲁迅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不但是近代文学，而且是现代文学；不仅是时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也是文学本体论、诗学和美学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

五、鲁迅文学的政治性与政治本体论：鲁迅的写作在其文学自律性、作者意识和形式自觉内部带有强烈的、无法回避或弱化的时代性、当下性和政治性。这种时代性、当下性和政治性同鲁迅文学本体论真理同在同构，因此需要在鲁迅文学批评和审美判断过程内部（而不是外部）感受、分析、解释和评价。鲁迅文学是“介入”的文学而非超脱的文学，是行动的文学而非“静谧”的文学，因此政治性是在鲁迅文学“内面”与“外部”的接触点和碰撞瞬间中，作为风格确定性的结构和实质而生成于鲁迅文学的文学肌体之中的。

六、作为写作的翻译：鲁迅是“作为译者的作者”和“作为作者的译者”。鲁迅文学始终运行在翻译与写作的共生结构之中。这个共生结构在词汇、名目、句法、话语和风格等层面都与中国新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同在、同步，它也是“翻译的现代性”的伟大实践。

下面依次对这六个原则或命题做一简要的展开。

文学鲁迅的首要性

鲁迅文学是鲁迅研究的首要问题。鲁迅首先是、最终仍是一位文学家。

文学鲁迅是历史鲁迅、思想鲁迅、政治鲁迅、革命鲁迅、教科书鲁迅（或任何其他版本的鲁迅）的前提和基础。脱离了鲁迅写作的实践、方法和文本，就脱离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丰富而高度个性化的鲁迅本身，也就脱离了具有理论和思想意义的鲁迅讨论。鲁迅留给我们的文字并不都是文学，但在鲁迅文字、文本和著作内部做出文学性和非文学性的区分和判断，本身是文学批评和美学批判的基本工作。对鲁迅文学的一般特征和总体面貌不断做出新的、具有批评和理论创意的描述、分析和判断，不但是鲁迅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所谓鲁迅思想（包括鲁迅在具体社会时空中的位置、立场和行动），本质上不过是鲁迅文学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阐释延伸；它也只有“在诗”的层面和诗学构造中，才有可能“比历史更富于哲理”（亚里士多德）。

回到鲁迅文学的首要性和第一性，就必须将鲁迅文学的文学性作为批评分析和阐释的直接对象，以图不断打开鲁迅文学本身的文学空间和理论丰富性。只有在批评和理论意义上确立鲁迅文学的首要性和独立性，才有可能有效、深入地分析鲁迅文学的文学现象学构造、它借以表达和结构自身的“世界观”，以及它同语言和写作样式的种种构成性/颠覆性关系。也只有通过对鲁迅文学自身形式、风格、结构和审美-政治原则的耐心细致的分析和阐释，方才可能进入关于鲁迅文学作为“现实表象”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的有意义的讨论。这些价值既不来自更不取决于鲁迅文学同历史的直接关系，而是在于经鲁迅文学风格自律性和审美强度的中介在写作中被生产出来，并由语言、句式、文体和寓意形象构成的特殊的“现实表象”。同时，“直面鲁迅文学”的必要性，要求我们同时在近代世界文学的脉络和语境中，在鲁迅文学诞生和再次诞生的具体历史复杂性、文化丰富性和思想强度的水准上再一次打开鲁迅文本。

强调鲁迅文学的文学首要性，也意在指出“鲁迅思想研究”这类命题的误读和误导性质。简单地把文学或“作家式”文字视为观念、思想和概念的记录与表达，从来都不是有效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文学在其语言空间和审美范畴中的存在不具有特殊的本体论构造和“哲学深度”。只是，后者来自鲁迅文学特殊的、历史性的“存在与时间”，即它的“存在诗学”和“时间政治”的双重性与一体性。鲁迅文学的世界观基础是近代科学物种发生学和进化论（所谓“人之历史”），这个生物决定论是鲁迅文学“存在的政治”的底色；它的审美形态和风格总体是存在、生命和生活的诗。这种“存在的诗”和“存在的政治”在鲁迅文学“存在的本体论”空间里是完全重合、共形的；但其文字表述或创作，却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两分。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lated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25-26. 德勒兹认为，写作并不受其对象限制，而是一种关系、能量、强度的聚合。因此“写作机器”同战争机器、爱欲机器、官僚机器、革命机器一样，都同事物的整体关系连接、联动；它的本质并非“表意”，而是对其他事物的探测和测绘、尺度和范围。

在鲁迅写作实践和方法论内部区分出一个更为严格的鲁迅文学概念，并不是要将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孤立的范畴而使之同其他范畴——比如政治、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思想认识、道德——相对立。一个在审美和价值论上都是独立自足的鲁迅文学概念并不将人们带向一个约定俗成的“纯文学”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鲁迅文学正是在同种种“纯文学”观念、偏见、神话、体制和特权的共存与对抗中，建立起自身的文学本体论辩护和风格规范。通过这个共存和对抗的关系，鲁迅文学获得它独特的自我意识，包括它的作者自觉、语言自觉、文体自觉和风格形象。所有这一切不仅赋予鲁迅文学独一无二的风骨和神韵，使之成为新文学传统中最具可辨识性和“作者范”（writerly）的文字、句式、语调和情绪色调，而且也在客观上为整个中国新文学提供了更高的道德基准和审美参照。唯其如此，今天的鲁迅阅读、鲁迅批评和鲁迅研究就有必要真正对焦于鲁迅文学的文学性，即那种使鲁迅成为鲁迅、为那架叫作“鲁迅”的（德勒兹哲学意义上的）“写作机器”（writing machine）^②提供能量、动力、装置、关系和结构的东西。这种从内部驱动鲁迅文学的个人欲望和社会欲望，以及它们自身想象的社会化、对象化和符号化过程，决定了鲁迅文学的领域。这是一个不断“非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领域：它在自身内部的结构与结构的颠覆、形式与形式的瓦解、自我建构与自我空洞化的往复运动中，不断开辟自身的文学空间和审美空间；但这种空间始终是那种更为本质性的时间运动和思想运动的结果和效果，因此保持着变化、可塑的相对或不确定状态。这种状态同那种欲望和能量一道，决定了鲁迅文学同它自身所属的现实环境的关系，决定了鲁迅文学的历史具体性和形而上层面的寓意结构。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本源性、奠基性作者。从《狂人日记》的发表开始，他18年的创作生涯伴随着中国新文学到他去世为止的全部发展史，并事实上处于这种发展的中心。鲁迅在他所涉猎的文学体裁和样式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许多方面至今仍是新文学精神实质和艺术理想的象征和标志。正因为如此，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进入鲁迅文学就是进入文学本身。换句话说，文学鲁迅的第一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把

鲁迅文学作为最高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学比较和文学理论的对象去认识、分析和研究；这种认识、分析和研究召唤一种开放、进取的眼界和心态，需要一种作为科学的文学研究的客观态度。同时，这种阅读和分析也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接近鲁迅文学自身所凭据的视野和深度，进而抵达文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提出问题并展开讨论。

鲁迅文学在内容上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经验的反映、再现、表象和象征-寓言，但它的风格、审美和精神面貌却通过某种文艺生产的半自律性而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时代条件及其限制。这就需要在近现代世界文学的环境和脉络、中国文学自身的源流，以及批评和理论意义上的审美判断三个方面对它的整体面貌做出一个初步的描述、分析和价值评估。

鲁迅文学得益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俗文学的滋养，早年的阅读经验以及此后伴随其一生的、通过古籍钩沉与辑校、文学史研究、文学评论与风格的自觉而系统建构起来的文学谱系，在一个隐秘而重要的意义上，特别是在语言内部和作者意识的“安身立命之处”，决定了鲁迅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继承者和发扬者的基本气质、品位、想象力和创造力。屈原、司马迁、魏晋文章（特别是嵇康和陶潜）对鲁迅文学的审美外观和内在道德品质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也是鲁迅文学内在持续不断的灵感源泉和道德凭据。此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学说、理念和精神气质中的许多方面，也与鲁迅的精神世界存在不可忽视的关联。

鲁迅文学的准备期和淬炼阶段是在近代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学直接的、系统的、笼罩性的影响下完成的。鲁迅所理解的文学，在本质上即广义的19世纪中后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高峰时代的文学；鲁迅本人18年的新文学生涯，重合于欧洲和日本文学、文化与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繁荣期，即所谓inter-war period。此期间各种现代文学流派、运动、思潮、风格实验、形式创新和文学思想观念，都不可避免地鲁迅和鲁迅文学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鲁迅在早期文学翻译中曾经历过关心“弱小民族”文学的阶段，此后也一直关心这方面的内容和议题，但鲁迅文学的总体却只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和日本文学发展主流和中心场域中才能得到恰当的分析、评价和理解。鲁迅文学固然可视为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作品实绩的一部分，但其本人的创作实践在形式、手法、风格和结构等诸方面，事实上都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写实主义范畴，因此必须在包括了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更为广阔的文学空间中予以把握。